

盖斯凯尔夫人

玛 丽 · 巴 顿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Mrs. Elizabeth C. Gaskell

MARY BARTON

根据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32 年版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
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
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
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玛丽·巴顿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25 插页 3 字数 356,000

1978 年 4 月新 1 版 1980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2,001—82,000 册

书号 10188·19

定价 1.65 元

译 本 序

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
社会面貌的变化，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
时期，出现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以及盖斯凯尔
夫人等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以生动而形象的艺术图
景反映了自己的时代和社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做了不同程
度的批判。根据这些作家在创作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和他
们所达到的艺术成就，马克思曾经称他们为“一批杰出的小说
家”，并说：“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
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
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① 在这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当中，女
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由于着重描写工人题材而特别值得我们重
视。

盖斯凯尔夫人，原名伊丽莎白·克莱格亨·斯蒂芬逊，生
于一八一〇年，死于一八六五年。父亲是位有相当文化修养
的牧师。伊丽莎白周岁丧母，父亲便把她送到纳芝城寄养在
姨母家。姨母是位有钱的寡妇，死后留给外甥女一笔遗产。盖
斯凯尔夫人结婚以前的一段生活基本上是在纳芝城同姨母一

起度过的。纳芝是一座偏僻的小城。盖斯凯尔夫人平时帮助姨母料理家务，十四岁到附近的斯特拉福镇一家女子学校学习三年。她还从父亲和姨母两家受到虔诚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是个典型的小康之家的妇女，唯一不同的是多受到一些文化教育。

她在二十二岁那一年，同曼彻斯特唯一神教会的副主持威廉·盖斯凯尔结婚，并随他来到曼彻斯特。盖斯凯尔夫人生活中这一变化对她日后走上创作道路是有一定影响的。她的丈夫不但是一位热心传教的牧师，而且是一位有相当修养的文学爱好者。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都是在他的鼓励下写出并遵照他的意见修改的。《玛丽·巴顿》章首的题诗许多由他甄选，有一部分未署作者姓名，实际上是出自他的手笔。盖斯凯尔夫妇在共同从事文学活动时特别注意关于劳动人民的题材，他们在这方面最早的成果便是合写的一首诗《穷人素描》，发表在一八三七年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上。盖斯凯尔夫人在协助丈夫从事教区工作的同时一直不间断地写作，一共发表过六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

她的创作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克兰福德》（一八五一——五三）为代表，描写她少女时代熟悉的小城生活；另一类则以《玛丽·巴顿》为代表，描写大工业城市中工人的生活与斗争。《克兰福德》以文笔幽默著称，跟《妻子和女儿》（一八六五）和一部分中短篇一样，以作者身边的亲友邻居为模特儿，描写偏僻农村或闭塞的小城镇上的生活。关于工人题材

①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686页。

的作品，除《玛丽·巴顿》以外，《南方与北方》（一八五五）写一个过惯了南方的保守、恬静生活的女孩子迁居北方的经历，通过女主人公的见闻把经济落后的南方农村与工业发达的北方城市做了对比，描写了一座工业城市的沸腾的生活和劳资之间的矛盾斗争；《路丝》（一八五三）通过一个天真而贫穷的女裁缝被资产阶级男子引诱而“堕落”的故事，抨击了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盖斯凯尔夫人还著有《夏洛蒂·勃朗特传》（一八五七）和历史题材的小说《西尔维亚的恋人》（一八六三）等作品。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全部作品中，《玛丽·巴顿》占着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里，作者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当时社会的另一个“种族”——无产阶级身上，把无产阶级的现实状况形象而真实地反映在作品中。

*

*

*

《玛丽·巴顿》创作于一八四六——四七年，出版于一八四八年。它直接以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和罢工斗争为背景，因此，这样一部作品在当时出现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

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是英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一八三二年实行了国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统治集团，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权利实行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措施，因此这一时期标志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发展。英国出口的棉、毛织品垄断着世界市场，而它从亚、非两洲殖民地攫取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当时正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然而这一切的繁荣昌盛都是建筑在对劳动人民、主要是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所

以国内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尖锐。女工、童工、爱尔兰移民等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使整个工资水平愈益下降,同时,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学说的精神所制订的新济贫法又取消了对一般失业者的救济,再加上一八三七年的歉收所造成的危机,广大工人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十九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代也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利而开展斗争的年代,与世纪初的捣毁机器者不同,现在工人阶级开始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敌人是谁,也更加意识到本身的力量。工人广泛组织工会,为保卫生活权利而进行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从三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在“饥饿的四十年代”,工人阶级走上了独立政治斗争的道路。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的名称是从英国工人提出的大宪章而得来的。在一八三七年的国内经济危机时期,伦敦工人协会代表英国工人阶级起草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六点要求。这六点是:确定男子普选权;议会每年选举一次;不记名投票;国会议员应有薪俸;取消国会议员的财产资格;选区平等。这六点虽然在本质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①。

总之,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令人怵目惊心,罢工斗争空前高涨。然而这一切在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正面描写工人阶级斗争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玛丽·巴顿》的重要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当时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7页。

的英国工人运动在文艺上不可多得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书中对当时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做了动人而细致的描写。盖斯凯尔夫人说：“我竭力使我的写作忠于事实”（本书原序）。她之所以能做到“忠于事实”，首先是因为她描写工人不是凭主观想象，而是凭她对现实生活所作的长期观察和体验。她长期住在工业腹地曼彻斯特，这不仅是英国棉纺织业的中心，而且也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中心。在这里，盖斯凯尔夫人“每天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与普通工人“擦肩而过”（本书原序）。她作为下层牧师的妻子，与工人有许多接触。从了解工人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优越条件在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当中简直是独一无二的，甚至连现实主义巨匠狄更斯，虽然对伦敦的下层生活了如指掌，也没有象盖斯凯尔夫人那样了解真正的产业工人。只有盖斯凯尔夫人，凭着这种特殊条件，经年累月地积累了关于工人的生活与思想的丰富知识，并把它们形象地体现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玛丽·巴顿》之中。

*

*

*

小说《玛丽·巴顿》中所反映的是曼彻斯特棉纺工人生活与斗争的故事。盖斯凯尔夫人首先通过工人的悲惨生活条件反映出他们所受的压迫与剥削。《玛丽·巴顿》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的萧条时期。当时“生意不好，棉布没有销路，许多货物都打了包堆在栈房里”（本书第 72 页），许多工厂先后停工。工厂暂时关闭使资本家有空闲陪伴妻子儿女游玩，举行快乐的家庭聚会。但是这幅画还有一个背面，那便是失业工人的家庭。对于工人来说，“空闲便是灾难”，他们的“家庭音乐会”是儿女们啼饥号寒的呻吟，“这里没

有早餐给他们去消磨时光；他们的时光全消磨在被窝里，一则可以抵御刺骨的春寒，二则躺着不动可以压低一些饿火”（本书第72—73页）。随着饥饿寒冷而来的便是疾病与死亡。戴文保的惨死，威尔逊一对双生子的夭折，只是众多牺牲者中的一、二例罢了。作者通过工人生活中的这些悲剧表明，资本主义为工人提供的非人生活条件，是造成他们死亡的根本原因。他们看来似乎是“自然”地死去，实际上是被资产者集体谋杀的，因为这些“自然”的条件正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最不愿意正视工人状况的真相，恩格斯把他们的这种虚伪态度叫作“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①，而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尽管对工人有一定的同情，也不愿意具体描写他们生活中那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惨状，不敢用那些“有伤大雅”的形象去冒犯资产者的“高雅情趣”。盖斯凯尔夫人却用工人生活中血淋淋的事实控诉资本主义制度，把工人住宅区的真相——躺在潮湿地下室的垂死者、在街心散发瘟病的污水沟以及工人生活中一切使资产者掩鼻而过的悲惨情景都毫不留情地摆在读者面前。当我们翻开《玛丽·巴顿》读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描写时，不能不佩服盖斯凯尔夫人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勇气。

《玛丽·巴顿》中还表现出了阶级地位与命运的不同是怎样必然地使工人与资本家从思想感情上都尖锐地对立着，以致资产阶级投下许多本钱经营的宗教宣传现在也不能把他们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275页。

维系在一起了。老工人约翰·巴顿一听说宗教二字就连忙说“那位上帝不也是大老板们的在天之父么？我可不愿意有那样的弟兄”（本书第82页），一语道破了教会作为资产阶级工具的本质以及广大工人对它的唾弃。这种鞭辟入里的暴露出于基督教牧师的妻子盖斯凯尔夫人的笔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盖斯凯尔夫人主观上一心想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统一于基督的爱当中。然而，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她竭力“忠于事实”，注意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表现工人阶级的思想面貌，有力地揭开了工人阶级胸中蕴藏的对资产阶级的满腔仇恨，具体而形象地表现出他们“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象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①。

盖斯凯尔夫人在另一部工人题材的小说《南方与北方》中写道，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永远只能是战争状态”，但是没有在作品中充分展开这个主题。而在《玛丽·巴顿》中，特别是作品的前半部，作者通过约翰和玛丽·巴顿父女命运的故事紧紧扣住以约翰为首的工人为一方和以卡逊为首的资本家为一方起伏曲折的矛盾斗争。小说描写了在一八三九年前后的萧条时期，物价飞涨，工资降低，工人被压得喘不过气，劳资之间从未间断的隐蔽斗争爆发为公开战争了。时逢宪章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很自然地汇入宪章运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410页。

动的巨流之中。一八三九年，饥寒交迫的曼彻斯特工人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去请愿，显然，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还存有一定幻想。约翰·巴顿被选为代表，人们要他向议会转告的请求，如不限定童工的年龄、请求国会议员多消耗一些布衣服以促进棉纱生产等，反映了当时工人斗争艺术的不成熟。宪章运动毕竟是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而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即《玛丽·巴顿》中描写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它还没有克服自己内部的弱点，这一时期“在工人和宪章派心目中唯一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原来就是宪章派的——就是合法革命的思想”^①。盖斯凯尔夫人在这里既表现了工人的阶级自觉，又把这种觉悟性表现得恰如其分，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历史面貌。小说没有正面描写伦敦请愿，而是从失望而归的约翰·巴顿口中表现了那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的骄横。他们无理地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在工人心里播下了新的仇恨的种子。约翰·巴顿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宽恕”（本书第131页）。紧接伦敦之行，工人又掀起新的罢工斗争。资本家接受一批外国定货决定开工，但仍把工资压得很低，因此引起了新的矛盾与斗争。小说也由此走向高潮。资本家不仅拒绝了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而且还极其冷酷地拿工人的饥饿滥楼开心。这种毫无心肝的行动成了一个导火线，燃起了反抗斗争的烈焰。于是发生了资产阶级死硬派小卡逊被暗杀事件。小说后半部的情节基本上围绕这一案件而展开。我们知道，在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形式中，偷盗、纵火、暗杀等行为

^① 恩格斯：《国内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50页。

虽然“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①，但也不失为工人斗争的一种形式。作者选择了这样一个情节是有现实根据的。据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记载，一八三一年工潮时期在曼彻斯特附近就发生过一件类似的案件，年轻的资本家埃士顿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枪杀，凶手下落不明。作者在《玛丽·巴顿》中围绕小卡逊被杀案件描写了资产阶级的法律程序，暴露了资产阶级法律平等的虚伪性。只因被害者是资本家，整个法律机器就立刻积极地开动起来要为他报仇。在老卡逊的催促下，警察局证据不足就逮捕无辜的杰姆，恨不得立刻把他绞死。在作者笔下，逮捕审讯杰姆的整个过程不仅表明资本家如何仗势欺人，同时还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对罢工工人报复性的迫害。

《玛丽·巴顿》中所表现的关于工人的生活与斗争的丰富内容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主要是不同类型的工人形象表现出来的。书中主要人物约翰·巴顿是位老工人，工人状况中的一切特点都非常集中地表现在他身上。他从小进工厂，为资本家干了大半辈子，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他的妻子与儿子都死于饥饿与贫困，现在唯一的女儿玛丽·巴顿也不得不做工谋生。约翰·巴顿深受资本主义之害，所以在斗争中特别坚决，他中了签就立刻执行工人的集体意志，枪杀了侮辱工人的资本家，毫不顾虑自己的安危。约翰·巴顿不是一个盲目蛮干的人。他善于观察和思考。他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和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01页。

有目共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很清楚地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于是他坚决摒弃了宗教观念而走上了斗争的道路。作者通过约翰·巴顿的形象使我们看到英国普通工人是怎样在事实的教育下觉悟起来的。然而约翰·巴顿的觉悟是不彻底的，他杀了小卡逊以后忏悔了，最后同资本家老卡逊和解。这种处理同作者前半部所表现的人物性格有些脱节，与其说是人物性格本身的发展，还不如说是反映了作者个人的主观愿望。

乔治·威尔逊虽然跟约翰·巴顿一样也是老工人，却属于另一种类型。他身上也具有工人的优良品质，但他受了一辈子的剥削，却至死也没有觉悟。跟他同属一类的还有一个戴文保。戴文保更走极端，他是个虔诚的非国教徒，最后饿死、病死，还念念不忘基督之爱。他们都是不觉悟的工人类型，在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宗教宣传对工人所起的麻痹作用。乔治的儿子杰姆与上述一类工人又不同。他是一家机械制造厂的技术工人，收入较多，不受失业的影响。他还“发明了一种不用弯轴或是什么机件的办法。他的厂主向他买了专利权，已经拿到了证书，杰姆得了他老板这一笔钱，一生一世有饭吃了”（本书第184—185页）。这种人身很少工人气息。他对广大普通工人的遭遇不关痛痒，对工人运动漠不关心，只关心如何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形象是老爱丽思和约伯·李。老爱丽思是被生活所迫跑到城里来谋生的最早一代老工人，虽然在城里度过了大半辈子，但对农村生活依旧十分怀念。约伯·李原来是个体生产的织工，由于大机器生产的排挤，贫困潦倒，靠外孙女卖唱来维持生活。从他身

上可以看出个体生产者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压力下逐渐被消灭的过程。

约翰·巴顿的女儿玛丽·巴顿也是书中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姿色出众、个性倔强的少女对父亲从事的斗争不感兴趣，整天陷入恋爱的纠葛当中。她幻想将来作阔太太，因为少东家小卡逊疯狂地追求她。说穿了，这不是什么“恋爱”，而只是“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①。这种事情在当时的下场总是男的结束一场“年轻人的胡闹”，而女的被遗弃沦为妓女。玛丽虽然没有走上这条绝路，但我们从她这段未演成的悲剧中，还是能看出资产阶级的无耻堕落和工人家庭中的妇女的悲惨命运。

总之，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构成了工人阶级状况的生动图画。作者善于把人物的个人生活和命运与阶级的状况和命运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如玛丽·巴顿的一场恋爱使她一度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最后她也卷入案件中被迫出庭作证，暴露出她自己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实际地位。这样既通过人物的个人命运表现阶级关系的本质，又使得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描写具有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玛丽·巴顿》中不仅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而且还写出了工人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的描写总是跟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水平相联系，有助于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就以玛丽·巴顿而言，作者细致地描写了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461页。

她羡慕资产阶级富贵荣华的虚荣心，但她的幻想的内容本身却又是同她作为失业工人的女儿的地位与状况相联系。资本家老卡逊的女儿要的是名贵的香水和玫瑰花，她说没有这些就活不下去，而玛丽·巴顿却幻想一旦当上阔太太，父亲就不再挨饿。这些幻想本身又突出了玛丽的天真无邪，因为她万万想不到小卡逊的追求只不过是玩弄一阵而已，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再如，工人在重重压迫下的抑郁愤懑也被表现得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作者写道，工人再也不能从古老的格言如“瓦片也有翻身日”、“苦尽甘来”中得到安慰了。他们既不再相信那些自欺欺人的格言，也不再受宗教宣传的麻痹，那么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斗争。作者在《玛丽·巴顿》中很准确地抓住了工人在饥寒交迫下思想发展的规律；约翰·巴顿作为一个走向斗争道路的觉悟工人形象之所以令人信服，也同作者的细致心理描写有关。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常有这样的情形：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做了深刻有力的揭露批判，但他们的理想、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则不但软弱无力，甚至是有害的。《玛丽·巴顿》一书中的情形正是如此。作者虽然做到真实地描写工人状况，但字里行间总难免流露资产阶级偏见，而在涉及工人阶级斗争的部分时，作者本人的偏见就暴露得更为突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她看到资本家的压迫剥削逼得工人不得不起来反抗，而作为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她又反对一切暴力斗争。小说中许多地方暴露出她对工人的斗争并不了解，如关于约翰·巴顿从事的工会运动，她只能写道：“有时是些苍白的陌生面孔，深黑的眼睛闪闪有光，对着昏暗的屋子里探望……有时是

一只手或是一条胳膊(身体躲在外边)伸进门来”(本书第152页)。这种描写不仅不具体,而且还有一种诡秘的色彩,流露了作者本人对这类活动的疑惧。作者在小说的前半部歌颂了工人们在困苦的生活中互相帮助的优良品质,而在后半部描写工人的斗争时,她不仅不歌颂工人的团结性和斗争性,反而突出地描写了曼彻斯特罢工工人如何殴打愿意接受低工资的爱尔兰移民。作者着力渲染这些人的穷困和被殴打后的惨状,借以表明暴力斗争的残酷性。作者甚至还为资本家开脱,借口外国商品的竞争来说明增加工资的困难,由此而衬托出工人罢工的不合理。作者反对暴力斗争的立场还突出地表现在约翰·巴顿性格的刻画上。约翰·巴顿在走上斗争道路之前被写成一个理想化的正面人物——好工人、好邻居、好家长,而一旦转变为工运中的积极战士,他的形象在作者笔下反而变丑了,被写成是冷酷无情的人。他对资产阶级的憎恨被说成是“错得很远”,是“病态的想法”,而他走上斗争道路的结果便是成为杀人犯。这种描写跟当时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真正面貌相去甚远。恩格斯在谈到一八四二年的曼彻斯特大罢工时说:“……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①约翰·巴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人,但由于作者的主观偏见,对他做了一些歪曲性的描写。作者甚至还把工人上层分子杰姆·威尔逊抬出来跟约翰·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13页。

巴顿做对比，竭力美化杰姆，津津乐道地描写他怎样孝敬老母，在爱情上忠实无私，为了掩护约翰·巴顿而宁可屈死一场等等。作者就是这样主观地在一个工人上层分子身上加了一些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抽象“美德”。

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中所正面宣扬的美德实质上是要工人阶级放弃斗争，不加区别地以爱待人。她同时也要求资产阶级对工人以爱相待，鼓吹劳资双方互谅互爱。约翰·巴顿与老卡逊的和解便是作为这种爱的最高典型来表现的。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老卡逊心软了，在雇佣制度方面实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等等。在这里，作者早已远离工人的现实状况而陷入主观臆想了。约伯·李作为作者本人的传声筒发表了一大段议论，他说：“纵使远水救不得近火——纵使他们想不出办法，结果只能对我们说：‘可怜的人们，我们的心也为着你们作痛；我们已经尽了一切的力量，可是无法挽救，’我们也就毫不畏缩地去和穷困挣扎了”（本书第 522—523 页）。在这里，作者已经把她在前面表达得如此具体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物质要求消融在抽象爱的说教里了；她宣扬的爱归根结蒂并不要求资本家放弃剥削，而只是要求他们表示出一些良好的愿望或至多采取一些改良的措施而已。然而仅仅是虚伪透顶的良好愿望或点滴改良，又怎能消除盖斯凯尔夫人在小说的前半部中所描写的工人阶级状况的巨大灾难呢？这是《玛丽·巴顿》的一个根本矛盾。盖斯凯尔夫人作为牧师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主观上真诚地实践自己的说教，并努力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关心周围的穷苦工人。然而她的信仰越真诚，她的主观认识就越不能超出基督教说教的思想框框，

因此就会愈加热衷于用无所不包的爱来调和一切矛盾，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正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是造成《玛丽·巴顿》中矛盾与局限性的总根源。

*

*

*

在资本主义时代留下来的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玛丽·巴顿》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部。不错，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有局限和缺点的，但是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对工人状况的描写始终是它的主要方面。《玛丽·巴顿》中关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与斗争、他们的思想感情、阶级仇恨的描写，有力地打破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幻想，揭露了这个制度的矛盾，而且具体地呈现了它的掘墓人的有血有肉的形象。正因它的这种大胆反映，作品一经出版便引起广泛重视，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工人运动发达的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匈牙利、芬兰等国都翻译出版，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玛丽·巴顿》所得到的并不完全是赞扬。它的大胆暴露得罪了资产者，当时的资产阶级官方报纸上连续发表评论，攻击作者“违背事实”，有的更露骨地说她“对工人状况具有病态的敏感”，而对“体面人和有地产的贵族”却抱有成见。这种攻击从反面更加证实，《玛丽·巴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起到了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仍然肯定这部作品的根本原因。

朱 虹

1977年10月30日